

Voltaire

卢梭与伏尔泰：  
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Rousseau et Voltaire:  
Portraits dans deux miroirs

[法] 亨利·古耶 Henri Gouhier 著

裴程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Rousseau et Voltaire: Portraits dans deux miroirs

[法] 亨利·古耶 Henri Gouhier 著

裴程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 (法)古耶著；裴程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巴黎丛书、蓝色系列)

ISBN 978-7-5617-5705-5

I. 卢... II. ①古... ②裴... III. ①卢梭, J. J. (1712~1778)—哲学思想—研究 ②伏尔泰, F-M. A. (1694~1778)—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950 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吴雅凌

封面设计 / 魏宇刚

Rousseau et Voltaire. Portraits dans deux miroirs

by Henri Gouhier

Copyright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Paris, 1983[http://www.vrin.f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8-240 号

巴黎丛书

## 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法)亨利·古耶 著

裴 程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640×978 1/16

插 页 2

印 张 41.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705-5/B·353

定 价 4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译本前言

## 卢梭和伏尔泰：新旧世界之交的两个巨人

歌德曾经说过：“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诞生。”〔1〕短短一句话，切中了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关系的要害：他们俩同为新旧世界之交的历史巨人，启蒙运动的主将，距离不可谓不近；然而毕竟一旧、一新，着眼点不同，所以两人虽然同时叱咤欧洲文坛达半个世纪，相互却恍若隔世，其间距离又不可谓不远。加之他们各自的个性、共同的朋友圈子、生活际遇等因素，使俩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又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所以，自从伏尔泰和卢梭在 1778 年相继去世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了法国乃至欧洲思想史界的热门话题。不仅像康德、歌德、柏格森、罗素这些大家有所论及，以此话题充当饭后茶余谈资的寻常文人骚客，也不乏其人。

在当今众多以伏尔泰和卢梭为题的论著中，亨利·古耶的

---

〔1〕这句话被许多论著引用，其中包括法国《大百科全书》“伏尔泰”条目。但是本文作者经多方查询（包括向法国和瑞士的“歌德学院”咨询），未找到直接出处。据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专家根据歌德同启蒙运动有关的论述推测，这一句话很可能是后人概述。此注，敬请方家指点。

《卢梭和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已经成为经典。这当然同作者资深识广分不开。从 1898 年 12 月出生，直至 1994 年 3 月去世，亨利·古耶享年九十六岁。他二十七岁开始讲授哲学，三十岁任教授，其中在索邦大学任教长达二十七年，并于 1979 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古耶在漫长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生涯中，著作丰盛，仅专著就达五十多种。而且涉及面相当广泛，对奥古斯丁、笛卡尔、帕斯卡、马勒伯朗士、曼恩·德·比朗、孔德、柏格森、吉尔松等哲学家均有著述。《卢梭和伏尔泰》是他晚年力作，说他是毕一生所学以饕后人也不为过。作者收集大量史料，遍览伏尔泰、卢梭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书信；分析细致透彻，论证严谨；且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然而，本书之所以经典，关键还在于作者的立意：“研究者自我审视”，暂时忘掉（或者用现象学的术语说：“悬置”）那些后世对伏尔泰和卢梭形成的观点，“制作‘伏尔泰眼里的卢梭’和‘卢梭眼里的伏尔泰’这两部影片”。

我们不妨把贯穿这两部“影片”的“剧情”，归纳为三个环节：哲学思想的分歧，社会地位的差异，日内瓦的纠纷。当然，这里只是出于导读之便，才将三个环节拆开。其实，统观卢梭和伏尔泰之间的关系，三个环节相互穿插、互为因果。正因为如此，这一段发生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故事才别具一格，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被史家津津乐道。

众所周知，哲学史称的“启蒙运动”，与其说是某一种哲学流派，不如说是产生于欧洲 18 世纪的思潮。康德在 1784 年写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的精神就是要人类承担自己的责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放出来。“Sapere aude!”勇敢地施展你的智慧！这就是

康德为启蒙运动总结的口号。其实，在 18 世纪的“欧洲文学共和国”内，群星璀璨，众说纷纭。启蒙运动的精髓不在于“同一”，而在于各种差异思想在相互批判中形成“统一”的运动。“承认思想差异”和“提倡批判精神”，是欧洲社会经启蒙运动涤荡，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存在着哲学思想的分歧不足为奇。

尽管伏尔泰常用“哲学家”或“真正的哲学家”称呼像达兰贝尔、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而且也以“哲学家圈子”的朋友自嘲，但是他真正的抱负不在哲学，而在诗和悲剧作品。如今，在伏尔泰丰厚的著作中〔2〕，被阅读和引用最多的却是《查第格》、《天真汉》、《老实人》这些散文体的故事，这恐怕也是他当年没有料到的。从严格的哲学史角度看，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正如法国伏尔泰专家勒内·波莫(René Pomeau)所说：“伏尔泰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些他经常喜欢论及的观点。换言之，这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整体，而且飘忽不定。”〔3〕我们不妨在这些“结构松散”的思想中，把握来自两个方面的主要影响：一个是笛卡尔和勒洛伯朗士的理性主义；另一个是牛顿的“第一推动力”说〔4〕。崇尚理性、热爱科学，这是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最有力的武器。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伏尔泰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无疑是最彻底、最不留情面的。他号召“哲学家们”团结起来，“粉碎邪恶”。甚至说出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徒“都是用粪

〔2〕 法国国家图书馆 1960 年以前典藏印本总目录二百三十一卷中，伏尔泰著作近六千个条目，独占两卷。这是绝无仅有的。

〔3〕 René Pomeau, *Voltaire*, Seuil, 1994, p. 80。以下简写“René Pomeau”。

〔4〕 伏尔泰在英国期间就深受牛顿自然哲学原理影响。1734 年住进西雷城堡后，又同情人夏特莱夫人一起研读牛顿。夏特莱夫人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拉丁文译成法文。

土和着腐朽的血浆捏成的”〔5〕这样激烈的话。他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基督教,而且触及一切形式的宗教狂(比如悲剧《穆罕默德》)。但是,与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不同,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并没有导致无神论。尽管他崇尚理性,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做人,就是施展理性”(他写《哲学辞典》,就是要“把理性按字母顺序排列”);然而,他觉得,面对大千世界,人类理性显得微不足道。他说:牛顿虽然发现了万有引力,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地球的自转由西向东而不是相反〔6〕。结论是:存在着一种超人的意志,它是人类智慧之光的来源。他在《自然宗教之诗》里,把人类的理性比作一团随时可能被熄灭的火炬,而上帝之光则像燃烧的太阳〔7〕。所以,伏尔泰接受了牛顿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一个至上的存在,它是世界的“设计师”或“钟表匠”,它不仅给“世界挂钟”最初的动力,而且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避免“挂钟”停止摆动。这个世界的钟表匠就是自然神意义上的上帝。在《查第格》第十二章中,伏尔泰借主人翁之口,对因为各自的上帝争论不休的赛尔特、埃及、迦勒底人说:“你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家都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出于对人类有限理性的无奈,或者用波莫的话说是因为对人类认识有限性的不满〔8〕。“伏尔泰的上帝就是牛顿的上帝,它体现为宇宙的和谐,它关注理智,而不是情感。”〔9〕换言之,伏尔泰

---

〔5〕 古耶,《卢梭和伏尔泰》,第131页(原版页码,在本书中以边码形式标出,特此说明)。以下本书引文,只注页码。

〔6〕 《哲学辞典》,“人类意识的界限”:“冷酷的决策者、能说会道的教育家、博学的理论家,你要寻找自己意识的界限吗?它们就在你眼前。”

〔7〕 参阅伏尔泰,《自然宗教之诗》,第二章。

〔8〕 参阅 René Pomeau, p. 86。

〔9〕 René Pomeau, p. 42。

的上帝，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理性”。

从自然宗教的角度看，卢梭可以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和伏尔泰最接近的一位。他和伏尔泰一样，认为要把真正的（自然的）宗教同历史的宗教区分开。基督教作为历史宗教的一种，败坏了人类自然的宗教信仰。卢梭借萨瓦牧师之口，对“神启”、“奇迹”、“原罪”等圣经的基本信条提出质疑和批驳，并说从内心厌恶“一个和暴力连在一起的上帝”。这些看法，同伏尔泰的《五十人的说教》几乎如出一辙。难怪伏尔泰读了《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后，惊喜地说要把这本书“用羊革精装”。从他后来把《信仰自白》编入了1765年出版的《必读集》这件史实来看，当时的“惊喜”既非讽刺、亦非做作<sup>〔10〕</sup>。和伏尔泰一样，卢梭并没有因对基督教的批判走向无神论，他相信至高、至善的上帝。而且，当他在《里斯本震灾挽诗》里发现伏尔泰对至高、至善的上帝产生怀疑和悲观失望时，毅然提笔给这位大文豪写信，维护自然宗教“一是善，或者说一切为一而善”的乐天观点。他还婉转地指出二人之间关于上帝存在的共识，甚至说：“我更偏爱您的基督徒方式，而不是索邦神学院的那一套。”但是，“共识”并不等于“同一”。和伏尔泰不同，卢梭并不认为基督教和自然宗教格格不入。萨瓦牧师所要抛弃的，是背叛了耶稣教导的真谛、作为历史宗教的基督教。所以，尽管卢梭两次易教<sup>〔11〕</sup>，但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在致巴黎大主教德·博蒙的信中一再声称“我是真诚的基督徒”，并说明自己不是“某个神父的弟子，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这恰恰是伏尔泰

〔10〕 参阅第187—189页。

〔11〕 1728年放弃加尔文教，皈依天主教；1754年荣归日内瓦时，又重新皈依加尔文教。

不能理解的。

其实,在这个表面的对待基督教问题的分歧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自然宗教的出发点,这就涉及卢梭哲学思想的根本。如果说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出于对人类有限理性的无奈,他的上帝是点燃理性火炬的太阳;那么,卢梭的上帝则是来自人类内心的呼唤。萨瓦牧师曾发出这样的咏叹:“意识,意识,神赋天性,上苍永恒之音,孤陋寡闻然而聪慧自由的人们的可靠指南,善恶分明的准绳,它使人同神相似……”<sup>〔12〕</sup>注意,萨瓦牧师口里的“意识”不同于理性:“在灵魂的深处,有一个正义和道德的天赋原则……我把这个原则称为意识。”这就回到了1749年的“樊尚启示”和卢梭哲学思想的两本奠基著作:《论科学和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他在去樊尚堡看望被囚禁的狄德罗的路上,因读到第戎学院提出的关于科学、艺术的发展和道德的关系的论题,一时浮想联翩,以致喜极而泣。就在那一刻,他的“思想被千万条光束照亮”,“一个坚定的信念闯入他的思想”:“人性本是善良的”,是社会制度使人变恶<sup>〔13〕</sup>。所以,在卢梭看来,这个使人能够超越自然,倾听上帝之音的“意识”,就是善良的本性。他晚年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把这种思想观点的转变,称为由理性向情感的升华。所以,卢梭的自然宗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从这个意义出发,他对上帝的信仰,不是因为对人类有限性的无奈或不满,而是出于对人类善良本性的信念和期望。

---

〔12〕《信仰自白》,转引自第256页。

〔13〕参阅第28页。

从“樊尚启示”开始，卢梭用另一种眼光来考察人类和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sup>〔14〕</sup>作为《百科全书》的合作者和撰稿人，卢梭不会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针对的与其说是“神学家”的圈子，不如说是“哲学家”的圈子。《论科学和艺术》从社会现状出发，揭露科学和艺术泯没了人类纯洁、善良的自然本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非但没有升华人类的道德情操，相反，它们带来了狡诈、虚伪、屈从和争端。人类不再是自己主人，而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奴隶。继《论科学和艺术》之后，卢梭又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进一步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文明怎样一步一步地把自然状态的人变成历史的人，怎样产生了私有制，怎样因私有制造成了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怎样由不平等产生各种人间恶的根源。纯粹的自然状态并非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纯自然状态的人甚至可能从未存在过。但是，“自然人”（或“原始人”）是论证“历史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的本体论前提。卢梭是在把文明赋予人类的属性一层一层剥去之后，才提出超越历史善恶之上的人类原型的。所以，“自然人”与其说是一种虚构的“历史起点”，不如说是卢梭对社会现状分析、解剖之后达到的“逻辑终点”。

在启蒙运动摧枯拉朽的时代，卢梭对科学和艺术的批判，无疑是给“哲学家们”的一记棒喝。所以，在当时的法国，卢梭和伏尔泰的哲学观点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分歧。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绪论》中热情讴歌科学和艺术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指出《百科全书》的宗旨就是概述、

〔14〕《忏悔录》，第1卷。

普及和丰富科学和艺术。他还友善地指出,“一位颇富感召力的作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反对科学和艺术的观点”,只是“一时的失误”。

然而,分歧并非对立。毫无疑问,在揭露和批判超自然的神权对人类的奴役、确立人类自立地位的问题上,卢梭和伏尔泰以及“哲学家”们是一致的。他在1756年8月18日致伏尔泰的信中明确指出:“和您一样,我不能接受人们没有完全的信仰自由,不能接受有人竟然要控制属于个人的、别人不可干预的意识……即便这个人是国王,也不能接受。”<sup>[15]</sup>但是,在为确立人的尊严而“粉碎邪恶”的战斗中,卢梭比伏尔泰和“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背后,看到的是人类“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的本质。换言之,在卢梭看来,人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超越现有的生存条件,完善自身的存在。这个观点已经很接近海德格尔以后关于技术问题的阐释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人类寻求完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卢梭尖锐地指出,人类并不能主宰“完善”行为的一切后果;非但如此,在一个领域里的进步,必不可免地伴随着在另一个领域里的倒退。结论是:“善与恶同出一源。”<sup>[16]</sup>

我们不妨透过这两种认识社会进步的不同观点,区分两种面对人类的不同立场。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在科学的旗帜之下,以人类理性(广义)的权威来批驳和取代宗教的权威,理性是普遍性的,所以科学的真理也必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卢梭则认为,任何使人类偏移自然本性的权

[15] 第87页。

[16] 卢梭,《关于道德、个体和社会的书信》,《卢梭全集》,Gallimard,第三卷。

威都是恶的根源；所以，人类一旦成为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奴隶，和受神权摆布同样可悲<sup>〔17〕</sup>。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界通常认为，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思想最深刻、最富有现代精神的哲学家<sup>〔18〕</sup>。

正如卢梭专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指出，卢梭思想内部存在着“本体论的乐观”(人性本善)和“历史的悲观”(社会发展导致没落)的矛盾。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卢梭只是提出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卢梭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不仅认为人生来善良，而且坚信人是自由的。自由是卢梭对抗宿命论的有力武器。尽管他没有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从哲学上找到答案，但是他从教育(《爱弥儿》)、文学(《新爱洛漪丝》)和政治(《社会契约论》)等不同角度，勾画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爱弥儿”个性的自然发展、“朱丽”和“圣·普洛”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这一系列的努力，充分体现了卢梭思想的连贯性。

当然，真正从哲学上论证“纯粹理性”的完美、人类文化发展同自然和谐一致，这是康德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因为如此，康德这位理性主义大师才高度评价了卢梭的“批判理性”精神，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牛顿”<sup>〔19〕</sup>。

---

〔17〕 “荒唐的人类呵，你们不停地抱怨自然，听着，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你们自身！”《忏悔录》，第八卷，Gallimard, Folio classique, Paris, 2003, p. 473。下引《忏悔录》，皆为该版。

〔18〕 参阅 Jean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Gallimard, Paris, 1957; Tzvetan Todorov, *L'esprit des Lumières*, Robert Laffont, Paris, 2006.

〔19〕 转引自: *Encyclopédie universalis*, “Rousseau”。

“精神世界的牛顿”？假如当年伏尔泰听见康德这样评价卢梭，一定会说他和让-雅克一样疯了。因为，“伏尔泰生前一刻也没有想过，卢梭其书、其人将会在思想和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20〕。他对卢梭的最高评价不过是“天生小有才气”〔21〕。历史上的卢梭和伏尔泰镜子里的卢梭的这样巨大的差异，和他们一开始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分不开。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是造成伏尔泰对卢梭的误读和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22〕。

伏尔泰比卢梭年长十八岁，而且成名很早，尤其在戏剧界。他二十四岁就以悲剧《哀狄普斯》轰动剧坛，从此更名“伏尔泰”。据法兰西喜剧院的档案记载，伏尔泰剧作的上演次数，在30年代赶上高乃伊、40年代超过拉辛〔23〕。他于1746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并被路易十五指定为“宫廷史官”，获“国王内宫侍从”的头衔。波莫曾经幽默地说：伏尔泰在知命之年已经获得了一切，“自从《梅洛普》的巨大成功之后（1743年），他几乎辍笔。他只需享受、等待死亡”。若不是夏特莱夫人英年早逝，伏尔泰的生平可能就到此为止〔24〕。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伏尔泰当时在法国文坛的地位。与他相比，卢梭在巴黎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外乡人”——“日内瓦卢梭”，仅以《百科全书》“音乐篇”撰稿人的身份出入一些文学沙

〔20〕 第10页。

〔21〕 第174页。

〔22〕 根据古耶书中提供的史料，伏尔泰读过卢梭生前发表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

〔23〕 参阅 *Zair, Le Fanatisme ou Mohamet le Prophète, Nanine ou l'Homme sans préjugé, Le Café ou l'Ecosaise*, “Introduction” par Jean Goldwink, GF Flammarion, Paris, 2004。

〔24〕 René Pomeau, p. 21。

龙。这种社会地位的差距造成伏尔泰从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地俯视卢梭。

当伏尔泰收到卢梭寄去的《论科学和艺术》时，正在伯茨坦做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幕僚、兼法国文学老师。他深居普鲁士王宫，根本不介意一本“小学生的命题作文”〔25〕，甚至没有觉得有给作者回信表示谢意的必要。直至1755年8月收到《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伏尔泰方才回信致谢，措辞调弄，说出了那一番被后人一再引用的讥诮话：“先生，我收到了您写的反对人类的新书。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带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不过我失去此习已逾六十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很遗憾。”〔26〕诚然，文笔幽默是伏尔泰的一大特色。波莫这样认为：“在伏尔泰的笔下，严肃常常以玩笑的方式体现；然而，不带一丝严肃的玩笑，是很少见的。”〔27〕那么在这一番针对让-雅克的玩笑中，我们能找到什么严肃的内容呢？那就是对卢梭两本奠基性论文的误读。

斯塔罗宾斯基指出：让人类倒退到“四足爬行”的自然状态，这是人们经常轻易强加给卢梭的错误理解。在卢梭“煞费苦心”寻找的答案中，唯一排除的，就是“与禽兽同类”〔28〕。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伏尔泰是此类误解的第一人呢？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操虑〔29〕，卢梭的确不可能成为

〔25〕 参阅第35页。

〔26〕 第54页。

〔27〕 René Pomeau, p. 15.

〔28〕 参阅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TII, Jean Star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Gallimard, “Encyclopédie de Pléiade”, Paris, 1973.

〔29〕 1753年初，伏尔泰同弗里德里希二世闹翻后离开伯茨坦暂时寄居于萨克斯-戈达公爵夫人家；于1755年搬到日内瓦，入住“德里斯”。

他关注的焦点。他当时很可能只是浏览了卢梭的两本论文(亨利·古耶甚至根据回信的内容,提出伏尔泰当时是否已经读了第二本论文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伏尔泰一开始对卢梭两本论文的误读和误解,是导致他以后不理解或不想理解卢梭的“原罪”?否则我们怎样解释:伏尔泰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大文豪、大史学家,竟然没有对卢梭当时就引起轰动的一系列传世名篇做出应有的历史评价?<sup>[30]</sup>

卢梭则不同,从青年时代起,伏尔泰就是他心目中的泰山北斗,他只能自下而上地仰望伏尔泰。《哲学书简》激发和培养了他的研究兴趣,《阿尔齐尔》曾经使他“被感动得差一点没有喘过气来”<sup>[31]</sup>……伏尔泰在青年卢梭的心目中,无异于精神上的导师。这一点,他在《忏悔录》中也直言不讳。卢梭在1745年12月11日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先生,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在发奋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关注,能得到您对小有才华的后起之秀的提挈。”<sup>[32]</sup>这一句话是理解卢梭眼里的伏尔泰的关键。我们可以认为,在1756年8月18日卢梭因《里斯本震灾挽诗》致伏尔泰信之前,他一直在“发奋努力”,以博得大文豪的关注。当他以“两论”的作者身份,在1756年的信中直接和伏尔泰讨论神意问题时,恭敬的措辞背后,俨然有和大师分庭抗礼的架势。他直接了当地拿自己和伏尔泰相对照,指出:伏尔泰荣华富贵却举目皆恶,他虽然穷

---

[30] 狄德罗曾经为卢梭第一篇论文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他说:“它超尘脱俗;它的成功绝无仅有。”(转引自:《忏悔录》,第八卷,p. 444)同狄德罗相比,伏尔泰是何等麻木!若非误读误解,实匪夷所思。

[31] 第22页。

[32] 第12页。

困潦倒，却举目皆善；结论是：“您享受快乐，我抱有希望，期待使一切变得光彩夺目。”〔33〕《爱弥儿》、《新爱洛漪丝》、《社会契约论》等著作的发表，使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同伏尔泰的差距越来越小。然而，恰如亨利·古耶一针见血地指出，伏尔泰始终没有察觉到这个差距在减小。对此，波莫曾经提出过两个原因：一是衰老难免固执己见，二是长期远离当时欧洲文化中心巴黎，对卢梭在思想界的真正影响不甚了解〔34〕。这样就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对话方式：一方漫不经心、“无心恋战”，另一方则一丝不苟，越来越“咄咄逼人”。

可以想象，一个成功的学生得不到老师的认可和赏识，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既然卢梭要博得伏尔泰的关注，那么一定会对他的反应很在意，更何况让-雅克生性多疑，对别人的看法十分敏感（他晚年所作，无一不是要给后人解剖自己，作一个交待）。然而大文豪却以“玩笑”来打发两本论文。卢梭的回答虽然也不乏幽默（“切莫四足爬行：这世上谁都会比您强”），但仍然充满了对“老师”的敬仰：“您教导我们大家都挺直腰板、站稳脚跟，您自己就更应当身体力行。”〔35〕我们难道不能在这一句落地有声的赞美中听到一丝失望的叹息吗？让-雅克是否想到了那一位享受荣华富贵、为了“附庸风雅”而“牺牲了阳刚之美”的“闻名遐迩的阿鲁埃”呢？这一丝叹息，到了1756年致伏尔泰的信后，变得简直有些悲凉。不错，伏尔泰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函，使原本战战兢兢的卢梭如

〔33〕 第78页。

〔34〕 参阅 René Pomeau, *Voltaire en son temps*, vol. III, “Ecraser l’in-fame”, Voltaire Foundation, Oxford, 1994, p. 178。以下简称“Ecraser l’in-fame”。

〔35〕 第66页。

释重负。然而，卢梭所期待的，不是起居寒暄，而是就神意和自然宗教问题，同伏尔泰展开真正的讨论。遗憾的是，大师推托疾病缠身，“待到我康复之后才敢与君对枰而论”。但是卢梭的期待如石沉大海，在伏尔泰来信的末尾，他无可奈何地留下一句：“他从此再没有给我写过信。”直至写《忏悔录》时，他对大师的允诺仍然念念不忘，竟然臆测《老实人》是伏尔泰为应答他关于神意的讨论而作。

如若不是因为被卷入日内瓦的政界纠纷，伏尔泰也许永远不会把卢梭放在眼里，而卢梭也不至于对自己一直仰慕的大文豪说出“我恨你！”那样的怒叱。

卢梭和伏尔泰除了可能在 1750 年 1 至 6 月间巴黎的某个沙龙匆匆见过一面外<sup>[36]</sup>，再没有会晤过。生活的际遇使“日内瓦卢梭”成了巴黎人，而十足的巴黎“上流社会人”伏尔泰则反客为主地成了日内瓦人。所以，他们在日内瓦辞辩锋起地“狭路相逢”是在所难免的。

从政治立场上说，伏尔泰代表的是开明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维护君主制，反对民主共和制。他认为“人民缺乏思想”、“幼稚”、“盲从”，“不配独立自主”<sup>[37]</sup>。这些观点和卢梭的思想是不同的。伏尔泰在读了“果实人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时，甚至愤愤地批了一句：“穷鬼哲学”；称《社会契约论》是“反社会契约论”，矛头直指君主制度。

从社会阶层上说，伏尔泰本人就是家资万贯的大富豪。他早年靠做军用物资生意发了财。晚年在日内瓦城边的费尔

[36] 参阅第 7 页。

[37] 参阅 René Pomeau, pp. 75—77。